



深度

专访张铁志：爱与痛如何转化为礼物，送给当代者，未来人？

新书里，他把60年代当作伤口来接受，他说大时代也会过去，不必幻想时代站在我们这边，靠边时自有靠边时要做的事情……

特约作者 关天林 发自香港 | 2019-03-06



张铁志。摄：陈焯辉/端传媒

张铁志不是疯子，我确定，但他应该希望我们疯一疯，在这又无聊又喧嚣的时代。

至于疯狂的意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乌托邦追寻》。他的视线不断重返那个疯狂的年代，而他的写作则像扩音器，沸腾著金斯基、Bob Dylan、气象人、休伦港宣言、游击剧场和电视大辩论的噪音，一一被他收集，然后转化，让我们在那些叛逆的、愤怒的故事里听到历久不衰的强音，而想像力就是其中的主调。

但如果说他的第一本书《声音与愤怒》带著三十岁出头的热血，新书则加入了反思的痛调，为热血的时代留下残酷的结尾。再次回望，他不想只让人觉得那个时代有多么了不起而已，但又不想变得冷嘲热讽，他希望正视看似浪漫甚至被神话化了的时代里，自有其阴影、矛盾和复杂性：“你看到了阴暗面，才不容易被击败，你知道了革命是会失败的，反而有了力量。嬉皮在它的高潮中死掉，短暂却留下火种，尼克逊做了总统，但运动并没有停止。”

时代的确留下了伤口，而揭示向往背后的凶暴与困顿，也可能是痛苦的，但张铁志说他仍然乐观，他只想把受过的感动分享出去。1960年代是张铁志心头最常触碰的部分，柔软而灼热。



张铁志。摄：陈焯輝/端传媒

“你看到了阴暗面，才不容易被击败，你知道了革命是会失败的，反而有了力量。嬉皮在它的高潮中死掉，短暂却留下火种，尼克逊做了总统，但运动并没有停止。”

错过的年代

从垮掉的一代到今天佛系的一代，这六十年的世界固然翻天覆地，但和在政治、文化风暴中颠簸突进的1960年代相比，时代巨轮就像放慢了下来，当然更重要的是，那年代不仅仅是一场场运动的累积，它更象征著上世纪叛逆激情的震央，重塑了当时，也仍然重塑著后来世界的样貌。对1960年代来说，它的未来都是当代。

张铁志错过了那年代，也刚好错过了台湾戒严后风起云涌的80年代，但他没有错过这些年代的启蒙。他91年进大学，投身学运，读书也读到1960年代的事迹，但更切近的，当然是他仍置身于文化爆炸、思想解放时期的余波之中，火势纵然已经没那猛烈，种种故事依然流传著。“我感受到整个80年代的人都在寻找对抗体制的思想资源。”

对台湾来说，1960年代也是潜流涌动。政治空间终于在70年代初逐渐被打开，而火种正是在上一个十年悄然点燃。

当两个错过的年代交错，正好形成共鸣箱。他在大学埋首读马库色《单向度的人》，而三十年前的美国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人，也读著这本书；他的学长学姐参加学运被打压，但压抑在地表下的议题，从环境保护到性别，也纷纷冒起，更不用说混合地下摇滚和台语的新音乐生态的崛起……总之，秩序松解了，地壳开始摇动，张铁志从一近一远的两个年代的相遇，感受到情势与意志的相通，同样是山雨欲来，同样是乘时而起的高昂：“解严后是我的青春时期，与我同样无法目击的60年代景象产生了共鸣。”文化脉络固然不同，但对张铁志而言，比两个年代的启蒙意义异同、孰大孰小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是两个年代在一个人身上达到了某种互相理解。

但把台湾与欧美的民主运动相比，前者是否落后了？近年张铁志注意到，1960年代的台湾虽然看似在高压统治下陷于安静的泥沼，实际上却没那么苍白单调。“大学时读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讲60年代知识青年的压抑苦闷，影响我很深，这几年我都在想一个有趣的题目，就是当时的欧美思潮如何影响台湾这些青年，最初以为是迟到，其实前卫的力量早已萌芽，只等下一个时代开花结果。”对台湾来说，1960年代也是潜流涌动，而研究者近年亦著意挖掘，担任《新活水》主编的张铁志则特别提到当时的杂志《现代文学》和《剧场》，后者引介存在主义电影，某程度上也反映了在仍然严格的控制下，对普遍的生存荒谬的关注，政治性的杂志要到70年代才多起来。在美国那边，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刺杀身亡、尼克逊当选总统，同年，台湾的白色恐怖也蔓延到文艺界，柏杨、陈映真等人被逮捕，但不能镇压的却是潮流所趋，政治空间终于在70年代初逐渐被打开，而火种正是在上一个十年悄然点燃。

比两个年代的启蒙意义异同、孰大孰小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是两个年代在一个人身上达到了某种互相理解。



张铁志。摄：陈焯輝/端传媒

在佛系世代当摆渡人

张铁志在意的确实是火种。但佛系世代还在意吗？对改变社会现状备感无力的年轻人、失望受创的社运青年还在意吗？当自暴自弃仿佛成为某种标准姿态或唯一可供发挥的表现，我们想起“垮掉的一代”。张铁志在书中解释Beat Generation的Beat事实上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被击败的感觉，第二重却是超越“垮掉”的灵性追求，相较之下，当下的“垮掉”似乎不包含升华，更遑论商业化运作的收编。张铁志坦言他当然希望通过写作鼓励年轻人更多地介入、参与，而影响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我中学时已在听摇滚，但那时感受的所谓反叛是很抽象，可能只是对大人的一种反抗，直到进入大学，进一步了解文化背景，才了解音乐的时代意义，能赋予人们认同的力量。”他写《声音与愤怒》时也没想到影响别人，后来才知道有人读了之后去了组乐队。

但启发是如何发生的？单单相信文字、一本书可以打动人就足够了吗？张铁志也没有清晰的答案，但他本来也是意外地成为写作者的，他最初只想分享令他感动的人与事，而到了今次的新书，初心不改，但他想到了更多，想到奋进及其必然的困顿、大时代的浪漫与阴影，和香港：“写的时候常常想到香港。我在香港住了三年，经历雨伞运动，在2015年离开，直到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那种好像觉得没有出路的困境和失败主义的幽灵，甚至不只是政治上。香港比台湾更迫切地处于某种决定性的时刻，香港人比台湾人更需要作出各种大大小小的抗议，更需要点燃一些热血，或者就像休伦港宣言所说的，对抗无聊。”张铁志认为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固然有一群在政治上很活跃的人，但也有一些人，未必想过改变社会，追求小确幸、小清新，“我希望我的写作让这两种人都可以对话。”

“乌托邦可以很可怕，但我们也不是要追求确实存在的乌托邦，正如休伦港宣言说的，我们只是想避免一个缺乏想像力的世界。”

新书叫《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乌托邦追寻》，“想像力”还常常被成功学宣传者挂在口边，“乌托邦”？现在说得更多的是“恶托邦”。如果能让对未来抱持不同态度的人发生对话，对话的基础单纯是对想像力的信念吗？还是想像力首先就是一种“敢于”？张铁志经常强调，总有另一可能存在，大到国家，小到个人生活，但我觉得重点是，他的相信，是基

于历史见证者和意志诠释者的自我认同。对乌托邦的真切追寻确实发生过，想像力确实掀起过轩然大波，他刚好错过时代的高潮，但又自觉于那错过的近距离，那灼热的边沿，他能做的，就是把反抗叛逆的呐喊集中、扩音。

曾经置身火燄中的，不必然是萧沅所说的圣徒，但立于火燄之侧的，却多少是个智者，或像罗伯托·卡拉索谈“创造力”时说的“每一位作家的内心，都有一座等著开垦的花园，或者一位等著过河的旅人：没有更多了”，张铁志是时代狂潮边上的摆渡人，等待仍然愿意朝向未来的旅人：“乌托邦可以很可怕，但我们也不是要追求确实存在的乌托邦，正如休伦港宣言说的，我们只是想避免一个缺乏想像力的世界。”

“香港比台湾更迫切地处于某种决定性的时刻，香港人比台湾人更需要作出各种大大小小的抗议，更需要点燃一些热血。”



张铁志。摄：陈焯辉/端传媒

放弃大时代的幻想

说这不可能、那不可能的时代固然没趣，但既然称作时代，就多少是种常态。张铁志在书中不时描述那些风口浪尖的旗手不得不疯狂，身处如此时势，不得不如此，但时代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动力，说不定正因为身不由己才让疯子们发挥出超越时空的精神魅力，而张铁志也正正在时代必然的局限里看到行动的必要：“我进大学时，社会风起云涌过，正迈向民主化，再回看欧美60年代，更加觉得时代不在我这一边，但这不表示不可以继续创造。搞读书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说服学生会，鼓动力未必很大，但也在累积某种势。”2013年香港开始谈占中，张铁志主持的《号外》便想介入讨论，而且希望激起新的想像，如把学民思潮摆上封面，都是尝试碰撞新的可能。

气象人印证著时代的双重围困：他们不得不疯狂，也不得不陷入自大的幻象，自以为掌握著革命的唯一旗帜，结果被自我中心所挫败。“大时代也是会过去的，不在急流之中反而可以想更多有甚么可为。”对大时代和革命的美好想像终究要抛弃，张铁志指出更可足恃的是组织：学校、社区的动员是组织，办杂志也是一种思想的组织。作为媒体人，由《号外》到《新活水》，张铁志相信思想上的沟通和长期的文化场域的争战，“长期才深刻。”我们都想起旧金山嬉皮士在商业化下变质衰败，散落为各地的小型公社实验，反而转入新阶段，开始更沉潜而多样化地塑造著现代生活的地理。

台湾面临的困境也雷同，社会鼓励聪明，却忽略了判断和思考，后者可能是慢速的，后真相时代却要求立即提供答案。

媒体的确不仅在见证，而且也在塑造神话——很多人著迷于1960年代，不就是因为一幕幕满怀信心而团结地追寻许诺之地的画面？火红的年代，恰好也是大众传媒趋于成熟的时候，两者互相造就，推动著风潮，也带来了商业操作的扭曲，张铁志在书中也注意到这问题，而在信息革命的今天，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是媒体，可以参与见证、塑造自己的神话，张铁志坦言太混乱，“假新闻、伪造的照片夹杂其中，十年二十年后也不辨真假了，更何况意义。”十几年前社交媒体兴起，他也自觉有助人们发声，但媒体也是需要创造的，没

那么简单，“需要counter force，包括有要求的编辑策划。我们需要民众力量，但也要结合专业，建立多元的格局。这是平衡这时代的重要挑战。”

这里触及了某种轻微的恐惧。乐观的张铁志想起书中叙述的，巴克利和维达尔电视直播大辩论后愈趋变质的媒体模仿，那一章就叫“在世界变得过于喧哗之前”。张铁志第一本书《声音与愤怒》取名自福克纳小说，小说的另一个译名是“喧嚣与骚动”，现在世界已然陷于更琐碎的喧嚣与更徒劳的骚动的循环之中，“以前电视台跟风制作辩论节目是为了吸引观众，现在的哗众取宠也是注意力经济，但注意力更彻底地商品化了，但求转化为广告收益，煽动一番之后，既没有讨论，更遮盖了真正的问题和矛盾。”

那真正的声音是甚么呢？理察·霍夫士达特写了一本书讲美国的反智传统，张铁志认为台湾面临的困境也雷同，社会鼓励聪明，却忽略了判断和思考，后者可能是慢速的，后真相时代却要求立即提供答案，“韩国瑜‘发大财’就是这种快速的答案。”偏偏包括想像力在内的智慧，却是需要时间培养的。

交换想像

“大时代也是会过去的，不在急流之中反而可以想更多有甚么可为。”

我们都向往青春未被定型、可被形塑的部分，如同我们对自由心存幻想。张铁志也是这样接受1960年代这份礼物，却又同时把它当作伤口来接受，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困顿与矛盾，一丝当今的仓惶也从中浮现。他乐观地相信疯狂，也不惮直视理想之痛，但这份爱与痛又如何转化为礼物，送给当代者、未来人？文字的纪录和纪念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事实，但年轻人会怎样理解？像张铁志透过台湾的文化解放年代领受欧美叛逆精神，接收礼物本应是更主动、自觉的行为，而他没说出的，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是，在喧哗、反智的时代做摆渡人并不容易。或许套用他之前说的，大时代也会过去，不必幻想时代站在我们这边，靠边时自有靠边时要做的事情。又或者，正因为巨轮愈转愈急速，遗忘愈来愈快，历史及其精神姿态才需要不断地追述、重审。

霍夫曼说革命最大的错是变得无聊，事实上，在想像革命之先，就要避免无聊。对张铁志来说，一再回望1960年代当然不无聊，因为他是借此召唤更多同行者。呼朋唤友，交换对未来的想像，总不会是无聊的。



热门头条

1. 没有伤口的职灾：那个替乘客脱内裤的长荣空姐，以及她的“制服病”
2. 3000多家园被强拆，候鸟老人与破碎的“海南梦”
3. 《还愿》情绪风暴之后，被吞噬的中国游戏人
4. 重磅调查：被强制绝育的淳子的一生
5.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国族神话下的北海道爱努族
6. 中国女工生育之痛：被强制流产后，计生人员又把埋掉的孩子挖出来
7. 白信：新疆的“汉化”，还是内地的“疆化”？——新疆纪行之三
8. 我是台湾人，在蒙古国教中文
9. 白信：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
10. “正妹、高分、老残穷”：这群台湾高中生对放榜新闻说不

编辑推荐

1. 量多写不完、循环欠债、形式老旧：台湾小学生成为家庭作业的奴隶？
2. 羊毛党是个什么党？他们立志“吃干榨尽这人间”
3. 田禾：如何科学地反驳诺奖得主沃森的“种族决定智商论”
4. 机械存在主义：当人造人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
5. 她是菲佣，也是摄影师：“我希望告诉人们香港有多美丽”
6. 【书摘】沈志华：从历史经验看中朝关系的恰当定位
7. 白信：新疆的“汉化”，还是内地的“疆化”？——新疆纪行之三
8. 我是台湾人，在蒙古国教中文

9. 【书摘】任何革命最大的错误就是变得无聊：1969芝加哥八君子审判

10.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国族神话下的北海道爱努族

延伸阅读

张铁志：杜林普、保守主义与美国白人的焦虑

并不是到了杜林普，共和党才开始疯狂。

生祥乐队：以《围庄》谱一曲台湾石化产业的悲歌

生祥乐队新专辑《围庄》以石化产业的漫天铺地为经、常民的生活与抵抗为纬；以诗词衬托悲伤，用音乐抵抗遗忘。

张铁志：用独立书店进行一场宁静革命

愈是在一个被code决定的世界中，人们愈渴望更真实的互动，书店让人与书的物理质感可以相遇，让人与人的笑容可以相遇。

张铁志：美国民主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民主党要东山再起，当然要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但是少数族群的权利和多元文化不能撤退，尤其在新的特朗普时代。

张铁志：《OK Computer》二十周年，摇滚黑镜洞见未来

他们曾对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乐观主义，敲响巨大的忧伤警钟……